

末世蒼茫

智慧殿

中國哲學的智慧
境界宏濶、氣魄高潔
禪宗、心學、道教……
皆清人耳目、發人深省
可以相親



細說晚清思潮

吳方／著

智

慧

殿



吳方著 中華書局

末世蒼茫

細說晚清思潮

□ □ 叢書策劃：危丁明
責任編輯：盧建業

主 編

葛 兆 光

□

末世蒼茫——細說晚清思潮

□

著 者

吳 方

□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馬坑埔道5B-5F 2樓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

益高工業大廈12樓B座

□

版 次

1993年1月初版

©199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163 6

目錄

「且聽上回分解」(代引言)	一
「籠」裏人物盡白頭	六
避席畏聞文字獄	一一
乾嘉之學	一六
補說戴震	二〇
「中世紀」的怪圈	二五
百年憂患第一人	二八
天地東西南北之學	三五
狂來舞劍 怨去吹簫	四一
「經世致用」的舊瓶新酒	四七
西學之開端	五二
青史憑誰定是非	五八



由「道器」說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	六五
「海上蘇武」葉名琛	七〇
「天國」悲劇	七五
曾國藩與傳統秩序	八一
「湘鄉」之學・曾氏「工夫」	八九
走向世界的「取經者」	九五
晚清一樁怪事	一〇二
由白衣秀才到宣傳變法的政論家	一〇六
「報國無門」容純甫	一一二
保守派・洋務派・早期維新派	一一七
由舊趨新與「六經之外」	一二三
解鈴還需繫鈴人	一二九
亦商亦士鄭觀應	一三六
清流、清議一瞥	一四一
衛道者張之洞	一四六

「中體西用」面面觀	一五三
戊戌變法：又一場難圓之夢	一五八
「帝閭沉沉叫不得」	一六五
書生改制 野狐談經	一七三
康有爲的《大同書》	一七九
凌雲健筆意縱橫	一八五
試思「梁啓超現象」	一九一
思想界彗星譚嗣同	一九七
鐵馬丁當入夢來（關於嚴復）	二〇四
「士」的風格和章太炎	二一二
曲終人散 滿目夕山	二一八
白髮書生寂寞心	二二三
後記	二三〇

「且聽上回分解」(代引言)

我們且試把歷史當作分章回的一本大書來看，那末眼下的世紀好像已近尾聲卻尚未寫完的一章，而十九世紀呢，則肯定如剛剛翻過去的上一個章回，儘管覺得已是相當遙遠的事了。講歷史，往往欲說近事，先敘遠緣，改了小說家的一句套話，叫作「且聽上回分解」。

十九世紀在中國，正值末代王朝——清朝的後期，一百年間，不乏戲劇性。開頭趕上嘉慶即位，做了六十年皇帝加四年太上皇的乾隆終於死去。史家所謂「康乾盛世」一去不返。末尾，光緒時，正逢戊戌變法、維新失敗、庚子之變（鬧義和團及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一連串的事件。中間又有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及西潮東漸、洋務運動等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頭看，世事如麻。

清史近三百年，從正式定鼎算起（一六四四年），一共十個皇帝坐龍廷。從前一幅對聯有道是：

順天康民雍然乾道嘉千古

治國熙世正是隆恩慶萬年

聯語挺俗，卻湊巧把清朝前五個皇帝的年號嵌進去了（兩聯的奇數字分別組合），最後是嘉慶。按對聯的意思，似乎嘉慶正該承上啓下，延清祚於千年萬載，但世事難卜，常常結果與願望恰恰相反。好局面不長，從道光開始，清朝的天下頗不太平了。經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不到一百年，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終於塌台。如果將順治到嘉慶這一段稱為清朝統治的上行期，那末，從嘉慶開始的十九世紀恰好正是清王朝氣數由盛而衰的下行期。這是一個對中國人來說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代，思想也格外震盪的時代。

人們愛用「下棋」來比喻世情人事，譬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話。可是說到十九世紀中國的這一局「棋」，可就不僅「當局者迷」，連旁觀者也不容易看得清楚。本來那一套傳統的套數、應付局面的「定式」、「走法」，到這時想不到全不大靈驗了。顯然，對於這一「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歷史學家特別指出，是西方列強用軍艦大炮的衝擊波，給十九世紀的中國社會帶來了結構性的震動、搖撼。話雖說如此，但只是說到了中國所遭受西方壓力的一面，並未講傳統中國文化的反應如何。實際上，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對外來挑戰的反應，第一是缺乏準備，第二是過程十分艱難，第三，結果呈悲劇性……這可能會激發產生反省意識的思考：曾經高度自我完善、與本土生活相融合的傳統思想體系，在十九世紀局勢的衝擊下，是否暴露了它自身的問

題？

雖然當時內憂外患，已經有許多的難題、麻煩，但恐怕最要緊的問題，首先還在於是否認識到自身有問題。「變」與「怎樣變」，也首先需要將看世界看自己的態度變一變。然而就這麼一回事也很不容易說通，所以說在中國改革的阻力總是很大的。譬如，甚至已到了同治年間，大學士倭仁還在那裏反對國家招考學習天文、算學的人員。他的理由是講，凡學問都以中國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國去學習。他這麼自信，別人就說，「既然如此，那末就請老先生保舉出幾個人來吧。」然而倭仁雖然保舉不上來，卻還是要固執下去。而且當時這種固執還盤據於不少人的頭腦中，如知識階層中亦尚有不少人抱有華夏第一的文化優越感，不肯拋棄「中國乃天地之中」的想法。直到清末，湖南的葉德輝還說：「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為黃種，是開天闢地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見《翼教叢編》卷六）簡直是強不知以為知，自說夢話了。

細想，許多事並不宜於一笑置之。因為除開對世界的認知是盲目的以外，即使幾個有識之士，要朝外打開一點兒思想的窗戶，也很難。「勢」難扭，自因這「勢」裏有上千年定勢的積澱和制約，從思維內容到思維方式以至於文化心理都不能不受到影響。

拿清代十九世紀的思想來說，它與傳統的關係，好像驛站與傳輸系統的關係，還是

被規定着的。儘管有它的個性和變化，又畢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前有」、「前見」（借伽達默爾的說法）的制約。

「前」有前因。儒、道、法、釋……思想意識經過上千年的接觸、互滲，形成與本土相適應的一套觀念，在器物技能層次、典章制度層次和思想行為層次分別得到反映和落實，形成變化可能性較小的定見。這種自我確定的慣性，其弊在於很難能創造性地提出新問題來，久之，造成一種思想路向極為狹窄的常規思維類型。例如一代代學人都將精力與智慧反覆投入到經學研究的磨道裏去，大儒智者無不把眼睛往古看，企圖在上古的道德遺訓中獲得規範現代行為制度的準繩，回歸到經典所陳述的世界中去。這樣，雖然也產生了關於人生、社會的許多精微見解，卻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傳統導向」，對「變」的理念的本能拒斥。

中國古代思想之大系，概略言之，由先秦子學到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又到宋明理學、明清實學，無論是講名實、道器、理欲、知行、體用，還是講人法、義利、德才，無論是儒道互補，還是陽儒陰法，大體總歸繞着「內聖外王」來發言。「內聖」為講究人心的「修身」，「外王」為講究外物的「治平」。總之是尋求一種人的精神世界和彼此相互關係中的合諧秩序。「天人合諧」也是講人際關係的，即按一定的倫

理綱常來「秩序」，如果不能用教化來維持。使用征服來維持，似乎上千年的歷史總離不開「秩序」的主題，連民間市井的小說戲曲也常常如此：人們喜歡看到有英雄好漢、志士仁人、劍客俠女、明君清官出來，懲惡揚善，維持或重建秩序。但是歷史還是帶來了一個新問題：這樣的秩序能否適應變動的時代（如光緒在上諭中也承認：「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它是否厄制自由的創造性的思想行為？換言之，它是否以犧牲社會發展的動力為代價的？在這兒，秩序和動力之間產生了深刻的矛盾。

當十九世紀悄悄降臨於一片古老土地上時，紫禁城的早朝仍像往常一樣按時開始，一輛牛車正在鄉間土路上發出吱呀的聲響，而中國歷史上極為動盪的一幕可能已經開始。只不過，人們也許還根本未意識到什麼，未發現有什麼問題。有蘇格拉底的想法——「未經審視的生活是無價值的生活」——的人畢竟不多，而事實上人類和人類思想的進步部分，畢竟是不斷提出問題和反省自身經驗的結果。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床上睡大覺，就有可能會漸漸爛掉。

「籠」裏人物盡白頭

思想者往往先是讀書人。有兩句老話說得挺淒涼：一句是「人生識字憂患始」，另一句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其實，許多書生、士子雖然常以淒涼自況，還是免不了要「憂患」，要「用世」，當然更不免有追逐名利的。退一步說，這樣那樣，他們總歸還得扮演時代要求於他們的社會性角色。

總的看，追溯思想的歷史，其實也就是看某個時代的理性在社會行動系統中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從這一點去看，十九世紀初葉的思想者們起的作用很微妙，他們近於一種適應性的角色。這和明末清初的情形大不一樣了。那時滿人揮師入關，江山易幟，一些具有啓蒙思想意識的明遺民，在孤獨中發揮了一些特異的思想，正是「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然而歷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清朝的統治秩序已穩定下來，而且文治武功一時還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統治者是有辦法的，「拉」與「打」，是用來對付讀書人的兩手。

隨着歲月沖刷，已不復有產生清初思想家「異質性」思想的土壤。思想者當然還得

選擇自己的方向，但選擇不能不受環境的限制，更不能不受支配社會結構的規範和價值觀的誘導和約束。

誘導、約束、限制，在清代的科舉制和文字獄裏面。

話說「科舉」，本是中國傳統社會組織結構中「選幹部」的系統。當然，作為籠絡方式對歷代讀書人也最有誘力。科舉在唐代定型，後世皆承唐制。其效果是否真如唐太宗所謂「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呢？大概「入彀」是不錯的，至於是否「天下英雄」，則頗成疑問。其實事情明擺着，即使科舉中真不乏出類拔萃者，登第後也只能按照體制的規定去扮演角色，出格是不行的。況且其才能多半只能表現於四書五經之學和做八股文的本領上。萬千學子寒窗苦熬的原是不切實際的學問。連康熙皇帝也明白：「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牢籠人才，舍此莫屬。」不僅人受牢籠，思想也跑不了。

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能站穩腳，其明智處在於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低度文化」，所以欲「制漢」，必須承襲明朝的思想、制度基礎。恢復舊式科舉並設「博學鴻詞」科，都屬於延攬人心的姿態。「博學鴻詞」，由地方督撫及大臣推薦人選，只要頗具聲名的皆可錄取，名高者多授翰林館職（俗稱「野翰林」）。不過清初時像顧炎武、黃宗羲、李二曲、傅青主這些人是死也不肯受召的，只是時間一長，作為適應性角色的讀書人也

沒了別的出路，漸漸適應這種「坑陷天下聰明才力之士」的陷阱，且以為是人世的唯一津梁了。人們會對牢籠式的文化環境逐漸適應起來，不覺地失掉自我。蒲松齡的《聊齋》對此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秀才人闖有七似焉。初人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闌場也，神情愴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繫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鉅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

科舉制度也不是一無可取，譬如說有個合理的形式，但這條太窄的路，實在是把產生新思想、新探索的可能性加以無形扼殺了。甚至舉業最後落到成為卑劣欲望的工具，「敲

門磚」，便成了它的代名詞。吳敬梓《儒林外史》曾借馬二先生的口，說道：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期，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

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倘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

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唸「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事情到了馬二先生說的地步，也還談什麼「道」、「理」、「仁」、「德」，只是一個「利」字罷了，加上趨時與逢迎。清中葉以後官場風氣之腐敗，官吏昏庸之誤國，誠非偶然。

讀書人的「入籠」現象，始於順治，盛於康熙。入籠之道，一為科舉，一為講官方認可的「理學」。康熙朝就有位號稱理學名臣的李光地，官做得很大，常常是一副最講

忠孝的樣子。但若揭老底看，他的高升卻有相當一些出賣人的成分。

三藩亂起正在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其時李光地回籍省親，趕上耿精忠在福州起事，李與陳夢雷合謀一次投機：一面由陳在福州投順耿精忠，一面由李以二人聯名用蠟丸上奏朝廷，表忠獻策，企圖左右逢源。蠟丸書是送到了朝廷，但李光地卻未署陳夢雷的名字，照他們打算，密疏獨上，如耿精忠成功，陳夢雷已不會計較，若耿失敗，則獨顯自己的忠貞，也避免了陳夢雷一旦出事會牽扯上自己。不論怎麼說，後來耿精忠失敗，李光地是平步青雲了。李、陳二人一個金馬玉堂，一個獄裏含冤。據說陳夢雷落得免死充軍，後以廿年苦功編成一部大書《彙編》，又被雍正帝奪去，改名《古今圖書集成》行世，總是落個鷄飛蛋打。

李光地是「人籠」即「人寵」的成功者，陳夢雷是失敗者，還有無數人失敗了；但「籠」中畢竟派生了大量舊秩序的適應者。這個事實最無情。

避席畏聞文字獄

在大陸「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有兩種整人的辦法，很流行過。一是「打小報告」，一是「上綱上線」定人以罪名。但這兩樣雖很行時，卻不能算「史無前例」。「打小報告」其實也就是告密的意思。清代就有密摺——臣下私自寫給皇帝且由皇帝親自拆閱的秘密奏摺——制度，對於皇帝操縱控制臣下，使他們互相監視，大概是很有效的辦法，說俗些，這正是「打小報告」的正牌祖宗！至於「上綱上線」，動輒對人的思想言論加以論罪、懲罰，古時的文字獄早有發明，更不乏「造獄」的先例。

康熙以後，數度大興文字獄，對當時及爾後知識階層思想的摧殘，太令人感嘆不置。龔自珍有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避席」讓人想到漢文帝對賈誼虛席相待，「不問蒼生問鬼神」，總還客氣，豈非後世的文字獄，真的叫人避席而逃麼？

《清代文字獄檔》中間，有相當一些可稱羅織的案子，甚至近於可笑。如「龍鳳祥香山印存案」：龍本是已被流放的官員，繼而又被搜查出印譜二冊，因貴州巡撫奏稱「圖章語句多有狂誕不經之處」，隨即鎖拿。審問時案犯供稱，因無聊，刻成兩本印譜，